

香港中文大學新文學課程之建立： 以香港青年文運、南來作家為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崔文東

摘要

本文藉香港中文大學新文學課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建立的經過，展示時人所謂「青年文運」與大學新文學教育的相互影響，探討五四新文學如何在殖民地的學院內確立經典地位。

國共內戰結束後的香港，相對於大陸與台灣，文化環境較為自由。青年學生通過中學國文教育接觸五四新文學，不以作家政治立場劃界，所得較全面。而當時報章文藝副刊紛紛創立學生園地，又湧現出《中國學生周報》等學生刊物，吸引青年學生從事新文學創作。在此風潮下，青年學生組織文社，互相聯絡，聲氣相應。到六十年代，青年文運紛繁活潑，如火如荼。

此時恰逢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成為港人乃至海外華人心中傳承中國文化的重鎮，也是充滿可塑性的高等學府，吸引了大批文學青年就讀。然而此時中文大學三所書院的文學教育，依然延續了整理國故的傳統，專注於文字、音韻、訓詁，以重振新文學為己任的青年學生深感不滿，或借助友聯出版社的《大學生活》等學生刊物，或創辦《盤古》等同人刊物，批評現狀，呼籲建立新文學課程，以推動新文學的發展，引發熱烈迴響。

在此情形下，中文大學三所書院先後於六十年代末開設新文學課程，既是對輿論壓力的回應，也得益於南來作家徐訏、姚克、李輝英，本地青年學者黃繼持等人的努力。他們開創的新文學課程，包括文學史的傳授，也有新文藝寫作訓練，風格各異，側重不同，或滲入離散經驗，或浸透國族情感，但都激勵了青年文運的發展。從今日的眼光看來，這一事件展示了南來作家、香港青年學生對於「文化中國」的共同想像，塑造了日後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一部分風格與特點。

一、緒論

1998年6月11日，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與評價」研討會，在此講授新文學課程已近三十年的黃繼持宣讀了〈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二省思〉一文，追憶了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起源：

六十年代中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香港形成學科之際，正是內地文化大革命之時，正因為對內地的實情不盡明瞭，對文革不免多方解讀，並與世界思潮聯繫而作出多樣詮釋。現代文學這方面，「讀書界」一時興起閱讀與談論「三十年代」（其實不只三十年代）文學的熱潮。大專學院之正式開設「現代文學」的科目，多少由於學生與「社會」的促動。初期的教研者，或是早有名望的新文學作家，或是居港的寫作界人士，還有本地大專畢業的一群。本地大專畢業這一輩，大學時期大多沒有受過現代文學研究正式訓練，先前課餘耽閱，而今登壇講授，只好多方取經（本國之外，加上日本乃至歐美），不過最大的策動力量，還在社會方面（又以青年讀書界為主）對中國文化（包括現代與古代傳統）的關切。於是「中國現代文學」在大學中文系一度成為最具「存在感受」、民族情懷、歷史關切的學科。¹

作為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開創者，黃繼持的回顧言簡意賅，既點出了創設新文學課程的時代背景，也談及教師的來源與努力，更提示出這門課程的時代意義。但是文章主旨重在反思，個中詳情也就沒有細細道來。面對塵封的往事，今日的讀者不能不有所疑問：「讀書界」何以興起談論新文學的熱潮？學生與「社會」如何促動新文學課程的建立？而黃繼持所說「初期的教研者」，主要就是南來作家徐訏、姚克、李輝英，以及如他一般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的文學青年，他們在新文學課程建立的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本文試圖結合香港五六十年代青年文運蓬勃發展的歷史背景，爬梳新文學課程在香港中文大學建立的歷史過程，嘗試回答上述疑問。² 在這段歷史裡，既可以看到時代的潮流，也不乏個人的努力，在我看來，香港文學青年與南來作家共同促成了五四新文學在殖民地的學院內確立經典地位，奠定了香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一部分風格與特色。

¹ 黃繼持：〈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二省思〉，《現代化·現代性·現代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頁63。

² 關於新文學教育的研究，可參見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尤其是〈新教育與新文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知識、技能與情懷——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憶、重構與闡釋〉等章；王德威：〈歷史，記憶，與大學之道：四則薪傳者的故事〉，《臺大中文學報》第26期（2007年6月），頁1-46。

二、呼喚新文學課程：以香港青年文運為背景

香港中文大學於 1963 年由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併而成，乃是香港第二所公立大學。併入中大的三所學校均源自中國大陸，合併初期，三所書院各自保持行政獨立，且均設有中文系。³就課程設置而言，三所學校的中文系均承襲了民國時期「整理國故」的傳統，與同時期台灣高等院校的中文系較為接近，而新亞、崇基、聯合等校的師資，除卻南來學者，不少也來自台灣。至於中國大陸上轟轟烈烈的高等院校調整，以及中文系教育「厚今薄古」的巨大轉變，並沒有影響到香港。為體現其課程特色，這裡不妨抄錄新亞、崇基、聯合三校剛剛組成中文大學時的中文系課表（1963 年）：

大一國文、大二國文、中國文學史、詩選、大三國文、莊子、史記、詩經、文字學、文心雕龍、韓文、詞曲選、陶謝詩、論語、國語。⁴

大一國文、大二國文、詩選、專家詩、文學批評、子書、詞、中國文學史、專家文、經學、禮記選讀、文字學、訓詁學、讀書指導、近代文學、聲韻學。⁵

一年國文、二年國文、中國文學史、專書（一）史部、專書（二）經部、專書（三）子部、專書（四）集部、小說、文字學、聲韻學、專集研究（一）古文，楚辭、專集研究（二）詩、文學批評。⁶

整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新亞、崇基、聯合中文系的課程設置變化不大，全部圍繞古典學問展開，且多為小學、經學的內容。就文學教育而言，一方面是古典文學史的傳授，一方面是古文、古典詩詞與古典小說的講解，在全部課程中佔不到一半。

對於這一狀態，大學生頗為不滿，而當時的雜誌為學生表達意見提供了平臺，尤其是友聯出版社在其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戰後的香港，友聯出版社是對青年學生最具影響力的出版機構，旗下的《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等刊物影響了一代青年，《中國學生周報》主要針對中學生，《大學生活》則以大學生為目的讀者，並積極組織學生活動，討論教育、文化、社會問題。⁷ 1961 年 1 月，「大學生活」雜誌社針對香港中文大學積極醞釀的形勢，邀請了三十多名來自新亞、崇基、聯合、珠

³ 這一局面持續到 1976 年，中大採取單一制行政機構，取消三校的獨立性，三校中文系也合併為一。參見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 1963-199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⁴ 〈本校一九六三年度上學期各院系課程總表〉，《新亞生活雙週刊》第 6 卷第 10 期（1963 年 11 月 1 日），頁 8。需要強調的是，歷年的《新亞書院概況》中也列有課程介紹，但是僅為開課計劃，有些實開課程甚至也未列入課程介紹，如後文論述的「新文藝欣賞與習作」，《新亞生活雙週刊》中的課表才是實開課程。

⁵ 〈校務概況〉，《崇基校刊》第 34 期（1963 年 12 月），頁 26。與新亞的情況一樣，《崇基學院概覽》中所列為開課計劃，《崇基校刊》中所列為實開課程。

⁶ 《聯合書院概覽·一九六三-一九六四》，頁 161。由於《聯合校刊》未能如其它學院一樣轉載實開課表，此處只能展示當年的開課計劃。

⁷ 關於友聯出版社的歷史，可參見陳維瑜：〈風雨同舟五十年——簡介【友聯社】的創始與發展〉，頁 1-13，2002 年 1 月 15 日，見盧瑋鑾教授所藏香港文學檔案資料庫〈<http://hklib.lib.cuhk.edu.hk/lovf/search.htm>〉。

海學院、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等校的學生，舉行「中文系問題座談會」，「就各校中文系之教授、課程、教學法、方向等現狀，作一客觀的、冷靜的分析及檢討，並提出改革中文系的要求」。⁸ 會上學生對當時港台地區中文系課程的批評主要是：

以中國傳統的「以人為中心」的思想為基礎，忽略純文學所應得的重視和地位，而高唱「文章乃經國之大業」及「文以載道」之宗旨，企圖將中國歷史、中國哲學融鑄在中國文學系一爐，所謂義理、詞章、考據合一是也，因此，課程編排頗呈混亂現象，致令讀完四年中文系之同學，結果對文、史、哲只粗懂皮毛而樣樣都不行，因此，彼等呼籲各校當局能明智地重作安排，在純文學之定義下辦理中文系。⁹

在與會學生看來，中文系的課程堅持中國學問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已然是膠柱鼓瑟，不能幫助學生掌握精深的文學知識。換言之，他們對於義理、考據興趣不大，認為中文系應該專注於詞章，也即是所謂「純文學」。在此思路下，他們提出，「在肯定中國固有文學之餘，希望各校當局能重新肯定白話文、新文學、西洋文學並開設文藝批評、文藝理論等課程，俾能培養出新的中國文學家來。」¹⁰ 雖然這一批評也涉及台灣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但是主要針對的還是香港，特別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三所書院。

其實在前一年，《大學生活》刊登的投稿已經涉及這一話題。這些文章除了批評中文系的學風，中文系的教育目標，對於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也提出了質疑。其中一位投稿者吳怡就認為，中文系的課程「老態龍鍾」，「沒有一科是跟得上時代的」，「對於一個近於不惑之人，還可以遷就遷就，但對於一個雄心勃勃的年青人，便有點耐不住了」。¹¹ 上述討論引起了文化界的關注，發行量頗大的《新生晚報》就刊載了相關文章。其中周維群（盧因筆名）批評本港中文系的師生「食古不化」，「只懂得韓愈李白，忽略五四後的中國文學」，¹² 孫曹劉則認為中文系應該「新與舊兼工，文言與白話並重」。¹³ 由此可見，大學中文系應該重視新文學，已然成為文化界的共識。

到了 1965 年，《大學生活》的「自由論壇」又重提這一話題。明之（中文大學，學院不明）最先投稿，在〈我對中文系教學的意見〉中對現有的教學法提出批評。¹⁴ 隨後聯合中文系的黃韶生（筆名黃濟泓）發表〈對現存中文系的幾點意見〉，對中文系課程設置提出全方位的抨擊：

⁸ 〈大學生活社開座談會 檢討台港中文系問題 文章經國有毛病 理應提倡新文學 教學方法應以輔導為主〉，《中國學生週報》第 451 期第 3 版（1961 年 3 月 10 日）。

⁹ 同上註。

¹⁰ 同上註。

¹¹ 吳怡：〈中文系學生的苦悶〉，《大學生活》第 5 卷第 17 期（1960 年 1 月 16 日），頁 34。

¹² 周維群：〈中文系往何處去〉，《新生晚報·新趣》第 3 版（1961 年 7 月 15 日）。

¹³ 孫曹劉：〈中文系應跟隨時代走〉，《新生晚報·新趣》第 3 版（1961 年 7 月 28 日）。

¹⁴ 明之：〈我對中文系教學的意見〉，《大學生活》新 2 卷第 9 期（1965 年 8 月 25 日），頁 8。

課程上，現存的中文系包括了我國古時的哲學、史學、地理學……及文學本身，這統領國故的範圍令「文學系」之正名大成疑問，當然，我們可以通過文學觀點去尋求一部分哲學、史學、地理學著作的文學價值，但很可惜，現行的教授方法只教我們明道進德，這是說，有一大部分老教授的眼光與學問大有問題，他們的學問得自他們的老師，也全盤承受了「厚古薄今」的觀點，他們用記憶力去吸收古典文學，卻不曾消化，他們講求「載道」，卻不知道文學的起源和可以發揚光大在於人類愛美的天性，他們不瞭解中國之外還有世界，不理會文學亦一如科學，不斷在向前邁進，但曉將經史子集用訓詁、考據、義理介紹給學生。¹⁵

顯而易見，黃韶生的意見與此前學生的訴求一致，但是更為系統，不僅認為文學教育需將史學、哲學等須拒之門外，也要求文學教育與時代同步。而黃韶生對課程改革也提出了具體的設想：

增設新文學課程——新文學運動已開始數十年了，無論在小說、散文和詩創作方面，又或在文學批評和戲劇方面，均已開創，並走上一條新路，但我們的文學系對此卻視若無睹，把它摒棄於門外，不肯承認這是我國文學命脈的繼延，實在，這一來，我國的文學才真正完蛋了。所以將五四以來新文學成績作系統整理，設立課程，使學者對新舊文學均能認識，並連貫起來，我們的文學才可以活下去，才可繼續生息不絕。

重視文學創作和批評的訓練——現存的中文系太重視古文之閱讀和抒寫，也太輕看新文體了，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只有深厚古典文學知識，卻沒有能力去鑑賞批評新文學作品，既無法創作，也不願批評，這一來，怎樣去做文學的接班人呢，文學新潮流的介紹，創作與批評的訓練，正是急不容緩了。¹⁶

恰好在此時，新亞中文系開設了「新文藝欣賞與寫作」一科，黃韶生與同在聯合中文系就讀的古兆申赴新亞書院旁聽，並採訪了講師徐訏，在發表於《大學生活》的訪談記錄結尾，兩人表示：「對於有真實學問的師長，我們的尊敬是打心裡生長的，而且充滿了期望，『在退潮的文藝沙灘上』，把一些美麗的貝殼撿拾起來，編織成帽子的邊緣，蓋在『國故學系』的頭上」。¹⁷ 言語間顯示出兩人對徐訏及其新文學課堂的期待，並試圖借報導擴大影響，增加新文學課程的聲勢。同期的《大學生活》也刊載了明之對黃韶生的回應，他的態度是不應該厚古薄今，亦不可厚今薄古，但面對中文系課程的現狀，他也提出「適當增加一、二門現代文學名著與欣賞」，¹⁸ 可見此時即使傾心於古典的學生，也認同開設新文學課程的必要性。¹⁹

¹⁵ 黃濟泓：〈對現存中文系的幾點意見〉，《大學生活》新2卷第11期（1965年9月25日），頁3。

¹⁶ 同上註。

¹⁷ 藍黃人（古兆申、黃韶生）：〈好夢幾許成真：霪雨中訪徐訏〉，《大學生活》新2卷第12期（1965年10月10日），頁4。

¹⁸ 明之：〈談中文系問題〉，《大學生活》新2卷第12期（1965年10月10日），頁8。

¹⁹ 黃韶生此後又發表〈給中文系的同學〉一文，但是主要討論的是中文系學生如何定位的問題，《大學生活》新2卷第15期（1965年11月25日），頁10。

一年之後，《大學生活》再次組織關於大學課程的討論，在「自由論壇」刊發來自香港各大高校的學生來信，回應黃韶生的觀點。例如珠海書院的文潮認為現代文學「實在使人太渴望了」，但是大學中文系「太過強調古典文學，五四運動以後的文學發展實在是被忽略了」；²⁰ 港大的天涯木批評中文系「三年所學不外是些古董，沒有一些活生生的新鮮氣味」，「對近幾十年來的新文學發展不聞不問，更莫說創作的訓練了」；²¹ 崇基的志無則稱，「許多當代的知識都與我們的課程無關」，「關於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課程，只有新亞書院辦了一科」，他對此提出質疑，「為什麼讓一些尋求新知識的青年去讀幾千（年）前的子云子曰？為什麼不讓上一輩經過的大時代融合在我們的課程中？」²² 珠海的廖弘援引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文系開設中國現代文學課程，並聘請徐訏前去講授中國現代戲劇、小說的例子，提出「文史系在課程上撥出三分之一的時間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實在沒有什麼不可以的」。²³ 此外，聯合書院的嚴重與徐明也批評中文系畢業生「對文學發展的趨勢及現代文學思潮一無所知」，²⁴ 「在傳統的文化中鑽（研）而缺少新的文學認識」。²⁵ 這些青年不盡是中文系的學生，而紛紛呼喚現代文學課程，可見此時新文學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隨後，新亞中文系的黃維樑對上述討論作出總結，認為「中文系課程的厚古薄今，與時代脫節無疑是最受人詬病的問題了」，「一般同學卻覺得五四後的新文學和西洋名著選讀、文學翻譯等課程實在有增設的必要」。²⁶ 《大學生活》為學生提供了發表意見的平臺，也賦予了學生話語權，1969年初，崇基中文系的學生由於學院依然未開新文學課程，不依不饒的提出批評，並提出：「要使香港的文壇活潑起來，我們一定要有五四以來文學課程開設」。²⁷

到1969年，中大三個書院都開設了新文學課程，此時青年學生的同人刊物《盤古》刊發了〈中文大學師生談中文系課程〉，採訪了講授新文學課程的新亞中文系講師徐訏、聯合中文系講師李輝英，聯合、新亞、崇基三校中文系系主任李棟、潘重規、鍾應梅，以及修讀了新文學課程的學生。此前積極推動開設新文學課程的黃維樑、古兆申既是《盤古》的成員，也是此次的採訪員，故而這篇採訪頗有總結階段性勝利的意味。²⁸

至此，青年學生實現了他們建立新文學課程的夢想。這些大學生對於文學教育的想像，重點在於承接五四傳統，繼續創造新文學，這種使命感體現在他們的字裡行間，譬如，「五四的各位文人努力在文學上開創了一個新局面，我們卻輕輕地把他扼殺了」。

²⁰ 珠海·文潮：〈一點感想〉，《大學生活》第1卷第4期（1966年4月15日），頁21。

²¹ 港大·天涯木：〈自由化、現代化〉，《大學生活》第1卷第4期（1966年4月15日），頁22。

²² 崇基·志無：〈攤開手掌！——看你得到什麼〉，《大學生活》第1卷第4期（1966年4月15日），頁23。

²³ 珠海·廖弘：〈給我們「現代」〉，《大學生活》第1卷第4期（1966年4月15日），頁23。

²⁴ 聯合·嚴重：〈走在時代後面〉，《大學生活》第1卷第4期（1966年4月15日），頁24。

²⁵ 聯合·徐明：〈課程與社會〉，《大學生活》第1卷第4期（1966年4月15日），頁25。

²⁶ 新亞·游之夏：〈我所感到的有關中文系的問題〉，《大學生活》第1卷第10期（1966年10月5日），頁33。

²⁷ 勸草：〈論崇基學院中文系之怪現狀〉，《大學生活》新4卷第2期（1969年2月15日），頁23。

²⁸ 黃維樑：〈從「芷蘭」到「盤古」〉，吳萱人：《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頁475。

我們對得起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嗎？」。²⁹ 換言之，在這些大學生眼中，中文系的課程應該幫助學生欣賞、批評、創作新文學，而非專注於國故的研究，他們重視的是審美與創造力，而非知識的積累。也正是在此視野下，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考據、義理之學，都因其與創造新文學關係不大，遭到排斥。

問題是，這些身處香港的大學生，為何對新文學心有戚戚焉？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學對他們的塑造。經由當時香港的中學教育，新文學的精神和視野，已經影響了許多香港的中學生，根據陳國球的研究，戰後香港與戰前一樣，所用初中國文課本「十九不離以前中華、商務、開明等課本開列的篇章」，³⁰ 涵蓋朱自清、夏丐尊、冰心、葉紹鈞、胡適、魯迅、周作人、徐志摩、老舍、巴金、許地山等諸多五四新文學名家的作品。在陳國球看來，這些作品「從四十年代的中國，接枝傳承，調控著香港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青少年的文學觀以至文化觀、人生觀」，而由於不少內地知識份子寄居香港，「直承『五四』遺風，所以會指出胡適是新文學運動的主要領導者，會教我們欣賞徐志摩『想飛』的浪漫；我們在課堂餘暇，可以多讀點周作人、沈從文、林語堂、梁實秋的作品」，這一代香港青年的新文學知識，比大陸、台灣的同齡人都要全面。³¹ 而由於香港相對自由的環境，青年學生在課外能夠接觸到的新文學作品也相對豐富，在這種情形下培養的中學生，自然而然對新文學產生親近感。

正是在此背景下，香港出現了青年文運，文藝青年紛紛組織文社，共同研究新文學，從事批評與創作，尤其是時六十年代初，文社運動進入高潮，零零總總有兩百多間，當時的報章刊物如《星島日報》、《華僑日報》、《香港時報》、《中國學生周報》也紛紛開闢園地，發表學生的文藝作品，一時間文藝氣氛如火如荼，³² 其中不少年輕人也因為愛好新文學，選擇了中文系。譬如前述呼喚新文學課程的中文大學中文系學生，均是當時文運的積極份子。他們與兩間文社密切相關。一個是芷蘭社，1962年秋，黃韶生聯合協同中學高中部的黃維波、楊懷曾、郭朝南、許定銘等組成，組織文藝講座，出版油印的《芷蘭文集》。至1964年秋，黃韶生、黃維波、楊懷曾等考入中大，又有古兆申、黃維樸等人加入。另一個是「藍馬現代文學社」，黃韶生與許定

²⁹ 同上註。

³⁰ 陳國球：〈借來的文學時空〉，《讀書》1997年第12期，頁43；陳國球：〈文學教育與文學經典的傳遞－中國現代文學在香港初中課程的承納初析〉，《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4期（2005年6月），頁95-117。

³¹ 陳國球：〈借來的文學時空〉，頁43-45。

³² 關於青年文運的研究與回顧，參見吳萱人：《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香港：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9）；吳萱人編：《香港文社史集初編（1961-1980）》（香港：採集組合出版，2001）；樊善標：〈學生的園地還是園地的學生——香港《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初探〉，陳平原主編：《現代中國》第十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242-256；許定銘：《書人書事》（香港：香港作家協會，1998）。可參見古兆申的回憶。古兆申：《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20。

銘等於 1964 年 8 月組織成立，古兆申隨後加入。³³ 此外，他們還參與編印《金線》（1965 年 6 月）、《蒲公英》（1964 年 4 月，1965 年 10 月）等文社刊物。³⁴

隨著文運的發展，參與者也開始回顧、研究五四新文學。這也就是黃繼持所謂的「讀書界」閱讀與談論「三十年代」文學的熱潮。以最富影響力的《中國學生周報》為例，1964 年 7 月第 627 期推出了〈五四·抗戰中國文藝專輯〉，發掘「聲名給正統作家們蓋過」，「作品被戰亂的烽火燒燬」的「前衛作家」，正如編者所說：

魯迅、茅盾、巴金、朱自清……我們聽得多了。我們熟知胡適、陳獨秀是新文學運動的先鋒，可知道穆木天、李金髮、戴望舒、卞之琳他們是中國現代詩的先驅呢？我們常常談老舍、王統照、沈從文的小說，有沒有注意到端木蕻良、駱賓基、穆時英、施蟄存、錢鍾書、無名氏這些同等偉大（甚至超過）的名字呢？我們現在讀痖弦、周夢蝶、葉維廉、鄭愁予、余光中的詩，可也知道十多廿年前王辛笛、馮乃超、孫毓棠、艾青、馮至、王獨清早已寫出很現代（也很古典）的詩篇呢？他們，還有其他許多的他們，都是在五四到抗戰期間躍出、而現今已少為人知（甚至無名）的英雄。

而這個專輯就是「分別從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翻譯、批評諸方面」，³⁵ 介紹其成就，重要的文章包括：戴天的〈中國的和現代的〉、余光中的〈下五四的半旗〉、趙聰的〈彌灑、淺草、沉鐘〉、朱喜樓的〈端木蕻良的小說〉、崑南的〈淺談無名氏初稿三卷〉、陳寧實的〈從周作人說起〉、張草分的〈功不可泯的媒婆〉和余衡山（李英豪筆名）的〈劉西渭和五四以來的文藝批評〉等。³⁶

這番展示別樣新文學史圖景的努力，迥異於同時期中國內地的文學史書寫，對當時的青年學生影響至深。在文社刊物中，《芷蘭季刊》第三期的《五四文學專題》最能反映這批青年學生對新文學的把握，包括四篇研究文章：四馬的〈五四文學概論〉、黃濟泓的〈沈從文一二〉、王誼的〈偏激的巴金〉和藍山居（古兆申）的〈草創時期的新詩〉。這很可能是對《中國學生周報》的模仿，但誠如許定銘所說，「這標誌著幾個文藝青年已進入學院派的門檻了」。³⁷

像所有的文社青年一樣，黃韶生、黃維樑、古兆申等也向各大報刊投稿，《大學生活》正是其中一個園地。《大學生活》也設法推動文運的發展，刊發學生的文章，討論文運的得失，對於文社會議記錄，也加以刊載。³⁸ 青年學生擁有足以依靠的媒體

³³ 許定銘：〈文社聯合國——藍馬〉，《書人書事》（香港：香港作家協會，1998），頁 182-184。

³⁴ 許定銘：〈金線·蒲公英·海風〉，《書人書事》，頁 185-189。

³⁵ 編者：〈寫在專輯前面〉，《中國學生週報》第 627 期（1964 年 7 月）。

³⁶ 許定銘：〈一個研究中國新文學的專輯〉，《醉書閑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頁 166-169。

³⁷ 許定銘：〈關於「芷蘭社」〉，《書人書事》，頁 207-211。

³⁸ 如胡明：〈青年文運與大學生〉，《大學生活》新 1 卷第 18 期（1965 年 1 月 5 日）；夏雨：〈青年·文運·自覺〉，《大學生活》新 1 卷第 19 期（1965 年 1 月 20 日）；車轟：〈讓我們站起來——談大學生與青年文運〉，《大學生活》新 1 卷第 20 期（1965 年 2 月 10 日）；白蘆：〈建設觀念——談香港的青年文社〉，《大學生活》新 2 卷第 8 期（1965 年 8 月 10 日）。

資源，又具有文藝創作的經驗，也對新文學史有獨到的看法，可以想像，一心繼承新文學遺產，試圖在創作上有所發揮的大學生，面對中文系「暮氣沉沉」的課程，自然難免失落甚至失望，紛紛加以批評也勢在必然。可以說，青年學生借助《大學生活》、《盤古》等雜誌，將自身訴求轉化為輿論壓力，這是香港中文大學新文學課程建立的重要推動力。

三、建立新文學課程：南來作家與本地學者的努力

香港中文大學的新文學課程，正是在前文所述的背景下建立起來。那麼，大學中文系的這一舉措，是否僅僅是對於學生訴求的回應？答案並非如此簡單，中文大學開設新文學課程的過程頗為複雜，需要正本清源的考辯。

根據目前流行的說法，李輝英最早於香港中文大學開設新文學課程，³⁹ 所據的資料應該是李輝英的自述：

一九六七年秋季開課的時候，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開了「中國新文學史」這門新課。說它是一門新課，那是因為在這以前，我們的大學中文系還沒有開過這門課的，只有大陸的大學裡，才開有這門功課。聯合書院校方的這一措施，就一般情況講，那是個富有改革性的舉動，其實那也正可以說是針對「中國文學史」一課的教材，做了有計劃的補充。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的課程的一個續編。
⁴⁰

李輝英的努力自然功不可沒，不過此後論者無不視李輝英為開創者，無形中忽視了姚克推動新文學教育的努力，遮蔽了姚克、李輝英兩人新文學教育的延續關係，也忽略了新亞、崇基新文學教育的發展，實在有必要加以補充。

這裡先分析聯合中文系的情況。其實根據上述引文也可以看出，李輝英並未自視為新文學課程的開創者，而稱其為聯合書院中文系的決定。那麼，是誰主持、推動了這一決策？在我看來，姚克在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身為著名劇作家、翻譯家的姚克，自 1960 年秋開始在聯合中文系擔任講師。任教期間，他積極推動校內的話劇活動，培育出崇尚新文學的氛圍。⁴¹ 大概由於姚克聲名遠播，1964 年秋至 1966 年秋，他代理系主任一職，1965 年秋至 1966 年秋又兼任文學院院長。⁴² 可以推測，擔任行政職務令姚克得以推行他的教育理念。他在接受《華僑日報》採訪時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文學教育觀：

³⁹ 例如張雙慶：〈回憶李輝英先生〉，《作家》第 20 期（2003 年 4 月），頁 7；劉以鬯：〈記李輝英〉，《香江文壇》第 23 期（2003 年 11 月），頁 6；古兆申：《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頁 20。

⁴⁰ 李輝英：《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1970），頁 363。

⁴¹ 古兆申：《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頁 19-20。

⁴² *United College Calendar 1964-1965*, pp. 82；《聯合書院概覽·一九六五-六六》，頁 42、38。

他認為自「五四」以來，新文學大受社會歡迎，學生不能知古而不知今，因此須從事新文學的研究。姚教授又謂：中文系學生將來出路，多從事教育工作，有些則做研究工作，在實用中，現代文學應用比古典文學較多。一個創作家，不需研究古典文學亦能寫出一本好小說。時代之趨向為發展向現代文學，故學術界及社會實際方面，應提倡新文學。對於如何提高大學生中文程度問題，姚氏認為由於古典文學與我們的時代有相當距離，因此讀起來很乏味，但近代小說最接近時代，容易瞭解便容易發生興趣，欲引起學生對中文發生興趣，必須先引起他們對現代文學產生興趣，繼續對古典文學表示好感，這樣才能提高中文水準。⁴³

大概因為面對的是新聞記者，姚克提倡新文學教育時多從實用的角度著眼，而且刻意出語偏激。當然，這也可以視作姚克面向大眾傳媒宣揚自己的教育主張。

與此同時，姚克也設法為中文系的新文學教學與研究創造條件。其中最重要的環節莫過於協助聯合書院圖書館從胡振手中購買千餘冊現代中國戲劇書（1965年），姚克宣稱，「本院中國語文系本來就有增設新文學課程的計劃，圖書館收購這一批藏書恰好可以配合這種需要」。⁴⁴ 不過姚克一直沒有指出自己是否主持了聯合書院的新文學教育計劃，也沒有相關檔案存留。但是當時聯合中文系其他教師都是古典文學研究者，⁴⁵ 再揆之以姚克的言論，不難確認他的開創之功。而根據時間推算，李輝英於1966年秋入職聯合書院中文系，擔任講師，⁴⁶ 這一決策也是姚克主持系務時做出的。後來姚克因大陸文革大潮刺激，於1967年秋退休，⁴⁷ 1969年初赴美國夏威夷大學任教。⁴⁸ 在此之前聘任李輝英，很可能是為了保證新文學課程有人接手。

那麼，姚克如何設計新文學課程？查閱那幾年的《聯合書院概覽》，可以看出姚克甫任系主任，課程綱要就出現了變化。1964至65年度出現了一組選修課，包括「文學概論」、「詩歌研究」、「散文入門」、「小說原理」、「戲劇理論」，其中最後兩門課的介紹明確提出講授古典及現代小說、戲劇的理論與實踐。⁴⁹ 1965至66年度的課程綱要則只保留了「文學概論」，主旨更清晰，「擴大學生之視野，使其瞭解文學之源流；各種文體之風格與體制；世界文學遺產與傳統等等，尤重在闡述近代文學之思潮與體系俾與中國文學作比較之研究」，而且規定「修本科之學生，須選讀世

⁴³ 拓菴：〈不薄今人愛古人——由吳康博士、姚莘農教授的意見，說到當前大學中文系的路向〉，《華僑日報》1965年9月27日第4張第2頁。

⁴⁴ 姚克：〈本院圖書館所藏現代中國戲劇書籍簡介〉，《聯合校刊》第15期（1967年7月），頁13。

⁴⁵ 這一時期聯合書院中文系的常任教師還有鄭水心、李雲光、李伯鳴、杜其容等，研究專長分別是古典詩詞、經學、韓非子、毛詩。*United College Calendar 1964-1965*, pp. 82；關於教師的研究範疇，參見鄧仕樑等編：《歲華：香港中文大學三十五年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師文藝作品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8），頁1-8。

⁴⁶ 《聯合書院概覽·一九六六-六七》，頁66。

⁴⁷ 同上註。

⁴⁸ 舒明整理：〈姚克的檀香山書簡〉，《文學世紀》第4期（2000年7月），頁48-56。

⁴⁹ 1964-1965年度僅見英文版的《聯合書院概覽》，上述課程分別為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 Critical Survey of Poetry, The Fundamentals of Prose, The Elements of Fiction, The Principles & Theories of Drama, *United College Calendar 1964-1965*, pp. 121, 161.

界文學名著譯本」。⁵⁰ 同一年《聯合書院概覽》還正式列出了兩門新文學課程：現代中國文學、文學批評（一）。兩科綱要如下：

一年課程。每週授課三節，導修一節。本課程之範圍，以現代之純文學為主。自清末以至五四運動，下及抗戰，每一時期之時代背景，文學作品產生之因素，風格派別之形成，及將來發展之趨勢，皆為講授之課題。學生須選讀現代詩歌、戲劇、小說、散文之代表作。每兩週並須繳閱讀報告一次。⁵¹

一年課程。每週授課三節，導修一節。五四以來，新文學乘時崛起，文既不同，銓衡亦異，傳統批評之準則，其勢已不能兼包，新之批評標準，遂因之建立。本科目的在使學生探索過去五十年來文藝思潮之轉變；並對現代文學批評加以研討；學生除選讀現代文藝之著述外，並須作批評寫作之學習。⁵²

概覽中的課程綱要不標註任課教師，聯合書院中文系又沒有實開課程表留下，但是根據前述中文系教授的學術背景，不難推斷出這些課程是由姚克設計的。但是在 1966 至 67 年度的《聯合書院概覽》裡，這些課程就不再出現。更奇怪的是，根據當年中文系學生的回憶，姚克當時主講中國文學史、小說史、戲曲史等課程，並沒有開設新文學課程。⁵³ 個中原因在於課程綱要並不代表實際開設的課程，「小說原理」、「戲劇理論」、「現代中國文學」、「文學批評」等雖然列在課程計劃中，但是可能由於姚克教務繁重，或者中文系人手不足，因而沒能開設。

雖然如此，也可由課程介紹看出姚克對於文學課程的設計。在他的視野裡，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相輔相成，既強調對文學史知識的把握，也重視文學批評方法的訓練。這一思路，也見於姚克隨後與學生的通信：

事實上中國現代研究戲曲小說的學者都是考據家而不是批評家。近年來出了夏志清等以批評為主的學者，但不甚多，而且都是研究西洋文學出身的。你如有意研究小說（或戲曲）須早立定宗旨，如從事考據，須修歷史及考據方法，如從事於批評須修西洋文學及文學批評，可是更須多讀中國小說和文學作品。讀西洋文學和文學批評，方能作比較，論同異，多讀中國小說和文學作品方知每一篇小說的淵源及其所受的影響，……⁵⁴

對於姚克而言，無論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文學研究主要路向不外考據與批評兩種，而兩類研究方法各有側重，需要以不同方式積累。既開設現代文學史、也教授文學批

⁵⁰ 《聯合書院概覽·一九六五-六六》，頁 124。

⁵¹ 《聯合書院概覽·一九六五-六六》，頁 125。

⁵² 同上註。

⁵³ 古兆申：《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頁 20。

⁵⁴ 舒明整理：〈姚克的檀香山書簡〉，《文學世紀》第 4 期（2000 年 7 月），頁 52。

評，正是為學生展示兩種不同的進路。⁵⁵ 這可以說是姚克心中文學教育，也是新文學教育的理想模式，遺憾的是，姚克很快去國離鄉，這一設想未能實行。

至於李輝英講授的新文學課程，則是李棟接任系主任時開設的。這應該是延續姚克在任時的計劃，但是李棟的大力支持也至關重要。雖然其專業是古文字學，李棟對新文學也甚感興趣。1969年，他在接受《盤古》採訪時，直陳「有人批評我以甲骨文的專家而去整理新文學，這只是興趣上的問題，我和黃孟駒先生雖然不發表新文學作品，但對它曾經研究過並且很感興趣」，⁵⁶ 這或許與他三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攻讀研究生的經歷有關，畢竟北京大學曾是「文學革命」的策源地。⁵⁷ 而這裡的「整理新文學」，指的是1968年，他與李輝英嘗試主編「三十年代文學叢刊」，⁵⁸ 由此也可看出他對李輝英的支持。

根據《聯合書院概覽》，李輝英剛剛入職的1966年秋，就開設「新文藝寫作」，不斷延續，成為中文系的固定課程：

一年課程，每週授課二節，習作一節。本課程針對現實，以今日新文藝之理論與實際為研究之對象。散文、詩歌、小說、戲曲之外，兼及小品文及報告文學。講授與習作並重，務使學生於新文藝之欣賞、批評及創作，得以平均發展。此科至少每兩週需交習作一篇。⁵⁹

隨後，1967年秋正式開設「中國新文學史」一科，到1969年秋改稱「現代文學」。兩者都是「一年課程。每週授課二節，導修一節」，前者介紹「從新文學運動以迄抗日戰爭開始時止，新文學發展之具體情況」，⁶⁰ 後者則擴展到「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六七年」。⁶¹ 根據李輝英的自述與學生的回憶，可以確定這些課程都順利開設。與此同時，他也在中大校外課程部授課，擔任現代中國文學課的教師。⁶²

這些課程對於李輝英而言並不輕鬆。他早年參加「左聯」，富有創作經驗，也經歷了新文學發展的歷程，⁶³ 但是就教學而言，他此前在香港大學負責普通話課程，⁶⁴

⁵⁵ 正如在信中指出的，姚克非常重視文本的閱讀，因而在課程綱要裡也不斷強調閱讀現代文學著作，這是他一向的教學方式，早在四十年代於聖約翰大學教書時，已經是如此風格。董樂山曾回憶：「到了日本投降後，我在大學最後一年時，這才有機會選修姚克在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開設的歐洲戲劇課。……我記得姚克是在日本投降前夕苦幹劇團遭迫害解散後到聖約翰大學來作兼職講師的。他開的歐洲戲劇課一共兩個學期，六個學分，前後要讀七、八十個劇本，從希臘的悲喜劇，到歌德的《浮士德》、莫裡哀的喜劇，一直到王爾德、蕭伯納的劇本等。每讀完一個劇本，還需寫一篇報告」。董樂山：《文化的休閒》（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頁166。

⁵⁶ 〈中文大學師生談中文系課程〉，《盤古》第23期（1969年4月15日），頁7。

⁵⁷ 李棟：〈三十年代北大中國文學系的回憶〉，《聯合校刊》第19期（1969年6月1日），頁29-33。

⁵⁸ 李棟：〈三十年代文學叢刊「小說選集」導言〉，《聯合書院學報》第7期（1968年6月），頁19-33；李輝英、李棟：〈編纂「三十年代文學叢刊」後記〉，《聯合書院學報》第7期（1968年6月），頁63-64。

⁵⁹ 《聯合書院概覽·一九六六-六七》，頁145。

⁶⁰ 《聯合書院概覽·一九六七-六八》，頁150。

⁶¹ 《聯合書院概覽·一九六九-七〇》，頁162。

⁶² 李輝英：《三言兩語》（香港：文學研究社，1975），頁228。

⁶³ 參見馬蹄疾編：《李輝英研究資料》（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四十年代末在長春大學、東北大學中文系開設的是「小說戲劇選」等課程，⁶⁵ 沒有教授新文學的經驗。好在他此前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廿年》等簡略的文學史著作，授課時就以此為藍本，「一邊講課一邊補充」，並整理擴充為《中國現代文學史》。⁶⁶ 可見確實如他在接受採訪時所說，「課程是在摸索中試教的」。此外他還編選新文學作品，發表學術論文，⁶⁷ 用他自己的話說，中文系對於新文學的發展，至少可以「做點兒研究、整理的工作，做多少算多少，少做總比不做好」。⁶⁸

那麼李輝英教學與研究的效果如何？他的學生張雙慶對此有中肯的評價：雖然李輝英「不算擅長教書，但他的態度是誠懇的」，「我們不在乎他平淡的學術見解，我們欣賞他拿出教師的良心，教我們怎樣走入學術研究的園地」。⁶⁹ 而根據王宏志的研究，李輝英贊同文學為政治服務，在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等著作時資料匱乏，出於教學需要，大量借鑒了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注重史實的介紹，缺乏獨特的見解與文本分析，且具有選本的性質，是一種政治觀點較為模糊的教科書式的文學史。⁷⁰ 由此看來，李輝英及其新文學教育的意義，並不在於傳授了多少知識——前述《中國學生周報》、《芷蘭季刊》的新文學研究在視野上都超越了李輝英——而是在於其象徵意義，標誌著新文學在高等學府確立地位。不僅如此，李輝英也借助課堂，積極推動香港青年文運。據張雙慶回憶，「我們一班人組織了一個小型文社，出版了油印的刊物《奔流》，李先生為了鼓勵我們寫作，把稿子介紹給當時《香港時報》的專刊」，⁷¹ 在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授課時，他也建議聽課的學生組織文社，並為其取名申社。⁷²

相對於注重新文藝的聯合書院，新亞書院向來以新儒家的重鎮而聞名。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新亞書院其實在三個書院中最早開始新文學課程。如前所述，自 1965 年秋開始，新亞中文系已開設了「新文藝欣賞與習作」。至 1969 年秋，該門課停開，取而代之的是「小說戲劇習作」、「中國現代文學」兩門，成為中文系的固定課程。而這些課程都是由徐訏教授，他於 1965 年秋開始在新亞書院擔任兼職講師，直到 1973 年

⁶⁴ 張雙慶：〈回憶李輝英先生〉，《作家》第 20 期，頁 7。

⁶⁵ 參見馬蹄疾編：《李輝英研究資料》。

⁶⁶ 李輝英：《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1970），頁 363。

⁶⁷ 這些學術成果，包括：〈新文學革命運動中的反對派——「中國新文學史稿」的一節〉，《聯合書院學報》第 5 期（1966 年 6 月）；〈唐代傳奇中的愛情故事——「中國小說史初稿」中的一節〉，《明報月刊》第 3 卷第 3 期（1968 年 3 月）；〈三十年代文學叢刊「小說選集」導言〉，《聯合書院學報》第 7 期（1968 年 6 月）；〈三十年代文學叢刊「新詩選集」導言〉（署名林山），《聯合書院學報》第 7 期（1968 年 6 月）；〈編纂「三十年代文學叢刊」後記〉（與李棟合作）《聯合書院學報》第 7 期（1968 年 6 月）；〈新詩選集補訂〉，《聯合書院學報》第 9 期（1971 年 6 月）；〈中國的現代戲劇〉，《聯合書院學報》第 10 期（1972 年 6 月）；〈三十年代反日題材的獨幕劇〉，《明報月刊》第 6 卷第 4 期（1971 年 4 月）。

⁶⁸ 〈中文大學師生談中文系課程〉，《盤古》第 23 期，頁 7。

⁶⁹ 同上註。

⁷⁰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 95-110。

⁷¹ 同上註，頁 8。

⁷² 李國參：〈李輝英取名的申社散憶及其他〉，吳萱人編：《香港文社史集：初編 1961-1980》（香港：採集組合，2001），頁 60。

春。⁷³ 與此同時，他於 1969 年起任浸會學院中文系兼職講師，一年後任浸會學院中文系主任，直至退休。由此看來，新亞、浸會兩校的新文學課程都是徐訏一手建立起來的。

不過，以徐訏兼職講師的身份，似乎沒有能力在新亞主動開設這些課程。而且新亞向來以研究國故而聞名，為何竟會率先開設新文學課程？在一次訪談中，徐訏曾提及開課的緣由：

中文大學當局知道有部分同學在研究古典文學或是義理、訓詁之外，還想欣賞一下新文學的作品，同時自己也從事寫作，他們需要若干的指導，因此就開了我這個課。所以這一科是為切合實際上的需要而設的。⁷⁴

相對於姚克在聯合書院的積極推動，新亞書院開設新文學課程更多地出於學生和輿論的壓力。當時新亞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潘重規，雖然專研訓詁、考據，也並不鄙薄新文學，曾要求學生「放開眼界，擴大胸襟，打破新舊古今的界限，不分畛域，努力充實自己，盡量吸收一切真正有生命的文學，繼續創作完成一切真正有生命的文學」。⁷⁵ 所以他所主持的中文系，順應輿論的要求，開設新文學課程，應該也是合情合理。聘請徐訏，顯然因為他既是名作家，又富有教學經驗，已經先後在珠海書院、南洋大學、清華書院等校教授新文學課程。⁷⁶

不過，這門課程在中文系只能說是聊備一格。據黃維樑回憶，這門科目是「選修科，一個學分」，徐訏「上這一門課時，講的多是一些文壇軼事，講他與其他新文學作家的交往。他沒有規定我們讀作品，也不制定什麼書做參考書。老師教得瀟灑，同學學得逍遙」。⁷⁷ 這與古兆申、黃韶生的記錄相符，徐訏的要求很寬泛，「在欣賞方面，我希望你們每星期至少看一本書，寫讀書報告，在給（寫）作方面，要求每月一篇。什麼體裁都不區（拘），小說也好、散文也好、詩也好。」⁷⁸ 這種教授方式與徐訏對文學創作的態度有關。他鄙夷「頭戴博士帽子，腰纏文學字典」的學院派，認為「文學入門」之類的書令人越讀越在門外，「老師能教的是技術與形式，是表現的方法」，「只要勇氣有愛好有興趣，它怎麼摸也就摸進去了」。⁷⁹

⁷³ 《新亞書院概況·一九六五-六六》，頁 15；《新亞書院概況·一九七二-七三》，頁 57。參見〈徐訏年表〉，徐訏紀念文集籌委會編：《徐訏紀念文集》（香港：香港浸會學院中國語文學會，1981），頁 348-349。但是該年表有誤，如兼任新亞中文系講師的時間標為 1963 年。

⁷⁴ 藍黃人（古兆申、黃韶生）：〈好夢幾許成真：霪雨中訪徐訏〉，《大學生活》新 2 卷第 12 期，頁 4。

⁷⁵ 潘重規：〈新舊文學與文學新舊〉，《新亞生活雙週刊》第 5 卷第 3 期（1962 年 7 月 6 日），頁 5。

⁷⁶ 參見〈徐訏年表〉，徐訏紀念文集籌委會編：《徐訏紀念文集》（香港：香港浸會學院中國語文學會，1981），頁 348-349。但年表未提及曾任職清華書院，此處據布海歌：〈我所認識的徐訏〉，徐訏紀念文集籌委會編：《徐訏紀念文集》，頁 112。

⁷⁷ 黃維樑：《中國現代文學導讀》（臺北：臺灣書店，1998），自序，無頁碼。

⁷⁸ 藍黃人（古兆申、黃韶生）：〈好夢幾許成真：霪雨中訪徐訏〉，《大學生活》新 2 卷第 12 期，頁 4。

⁷⁹ 徐訏：《場邊文學》（香港：上海印書館，1971），頁 IV。

至於「中國現代文學」一門，尚未發現學生的記錄與回憶。徐訏在浸會中文系也開設了同一課程，由於課堂講義後來整理為《現代中國文學過眼錄》，⁸⁰ 從書中內容可以大致推出講授的特色。誠如王宏志所言，徐訏的著作完全沒有關於文學作品的討論，乃是一本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史。而出於反共的立場，以及對於大陸出版的文學史的不滿，徐訏花費大部分篇幅討論左聯及左翼文學運動，但完全是批評的態度，以否定政治對文藝的干預，卻其實也包含了強烈的政治含義。⁸¹ 這與曾在浸會大學修讀此科的陳德錦的回憶一致，「徐先生講授的大部分是文學論爭和文學史問題，他有主觀的看法」，而由於「沒有預習徐先生課堂的講義」，陳德錦期末考試落敗，這也顯示出徐訏對其文學立場以及政治立場的堅持。雖然陳德錦聽課時，已是七十年代末，而早在六十年代末的〈五四以來文藝運動中道學頭巾氣〉等演講中，⁸² 徐訏已清晰表達了此類觀點，可以推測這也是他講授文學史一貫的風格，「只談論爭，不論作品」，⁸³ 不涉及藝術層面的討論。

其實，對於徐訏而言，教授新文學並非賞心樂事。他的真正興趣在於創作，教書更多是出於經濟原因。他剛剛任教於新亞時，就曾向友人抱怨教書的勞苦：「我實在太累了，不想向人家解釋，只想寫作。但教書令我心力交瘁，不能寫作」。⁸⁴ 之所以如此勞碌，可能與教授新文學的難度有密切關係。誠如他在訪談中所說：

研究民國以來的文學史確有困難，因為與當代的政治關係太密切，同時材料太多，不容易找。但從另一方面說，就是因為材料難找就愈應該從事研究。因為這些材料日漸在流失之中，越沒有人研究將來就更難找了。所以我以為對民國以來的文學史的整理和研究是當前的急務。⁸⁵

以徐訏的文學立場，自然不能同意大陸上現代文學史寫作的思路，此時雖然已經有李輝英的文學史出版，⁸⁶ 但是基本認同左翼文學的態度，想來徐也不能接受。所以要有「主觀的看法」，就不能不自己爬梳資料，根據自家觀點撰寫講義。從事筆路藍縷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自然佔用了寫作時間。

在香港中文大學三大學院中，崇基學院的新文學課程開設最晚。⁸⁷ 當時，新亞與聯合的新文學教育都逐漸展開，崇基不能不獨自面對學生與輿論的壓力，前述勁草的文章就是一個例子。想必是為了配合形勢，1969年秋，在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周

⁸⁰ 陳德錦：〈徐訏老師二三事〉，《香港文學》第190期（2000年10月1日），頁67。

⁸¹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頁151-168。

⁸² 徐訏：〈三邊文學序〉，《場邊文學》（香港：上海印書館，1971），頁21-38。參見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頁154-155。

⁸³ 陳德錦：〈徐訏老師二三事〉，頁67。

⁸⁴ 布海歌：〈我所認識的徐訏〉，徐訏紀念文集籌委會編：《徐訏紀念文集》（香港：香港浸會學院中國語文學會，1981），頁112。

⁸⁵ 〈中文大學師生談中文系課程〉，頁6。

⁸⁶ 李輝英就曾對徐訏的作品評價不高，見李輝英：《中國現代文學史》，頁269。

⁸⁷ 〈校務報告〉，《崇基校刊》第47期（1969年），頁2。

法高的建議下，⁸⁸ 並經中文大學三個學院中文系協商，決定把「中國新文學史」這一課作為院際共同課，並且規定要把課程內容講到一九四九年為止，同時課名也由往日一院單開的「中國新文學史課」改為聯合、新亞、崇基三院共同的「現代中國文學課」。⁸⁹ 這也是聯合、新亞兩院於 1969 年開設「現代文學」一科的原委。

在崇基講授新文學課程的教師正是黃繼持。與姚克、李輝英、徐訏等南來作家不同，黃繼持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是戰後成長起來的本土青年學者。雖然在就讀香港大學中文系時，黃繼持專研古典文學理論與宋明理學，但是他對於新文學也興趣濃厚，也曾參與文社活動。⁹⁰ 1967 年至 1969 年間，他正與志同道合的一班友人如張曼儀、黃俊東、古兆申、余丹、文世昌等選編《現代中國詩選》。據古兆申回憶，之所以從事這項工作，是因為他們共同發現「不論大陸或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都出現斷層」，他們的工作，關注的是「文學生命的延續」。⁹¹ 而古兆申其實受教於姚克、李輝英，也是撰文呼籲中文系改革的一員，⁹² 就年輩而言，黃繼持與古兆申等人相差不遠，他在崇基學院中文系開設新文學課程，其實也象徵了學生一輩邁入了新文學課程的講壇。

根據《崇基學院概覽》的介紹，「現代文學」一科的主旨，「在使學生對於現代中國文學之發展及演變趨勢，獲一概括之認識」。⁹³ 那麼黃繼持是如何令學生獲得概括的認識？幸而當時有選課學生留下了即時感懷，記錄了 1970 年春的課堂上，黃繼持如何著力講解三四十年代所具有影響力的作者，包括散文，小說，理論、戲劇、新詩。且看他對新詩的介紹：

「三十年代詩共有好多派」，他黝黑臉龐上的雙眉微皺著，瞇湊的眸子，加上嘴角掛著的淺笑，充份表現出他正沈醉於三十年代新詩作品中。「比較具影響力的有新月派、現代派、象徵派和漢園派。講到新月派，不能不談談眾所皆知的徐志摩」。他頓一頓，然後帶著那個淺笑轉身在黑板上寫下新月派幾個字。「志摩的詩，有一股純真、熱情，乃典型的青年詩人，不過作品由於過度任情而往往顯得露骨一點。志摩之死，使新月派由盛轉衰。其中陳夢家詩風頗似志摩，然早期便顯深沈，此其弊也。其他新月派的代表還有朱大舟、饒孟侃、孫大雨、孫毓棠等，但均為貴族文章，受浪漫主義影響太深」。……至於現代派，非相等於英文 Modernism，而是一種寫實主義，表現現實生活中的哀傷、棲苦、無奈，走向宇宙、

⁸⁸ 這一點是李校在接受參訪時透露的，〈中文大學師生談中文系課程〉，頁 7。

⁸⁹ 李輝英：〈後記〉，《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1970），頁 364。

⁹⁰ 例如華菁文社曾組織生活營，黃繼持發表演講，表達自己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看法。黃繼持：〈生活營的演講之一——我們這一代〉，《華菁》第 11 期第 1、3 版（1967 年 9 月）。

⁹¹ 古兆申：《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頁 23-27。

⁹² 同上註，頁 20。

⁹³ 《崇基學院概覽·一九六九-一九七零》，頁 89-90。

人生底層的探索。本來中國詩沒有所謂現代派的，直至廢仁（疑為戴望舒）把西方現代詩中國化，帶到中國詩壇，才有現代派的出現，在文學方面，影響殊深。⁹⁴

這些觀點後來也體現在黃繼持執筆的《現代中國詩選·導言》中，例如陳夢家的情詩「簡直是徐志摩詩作的複製品」，現代派「並不表示西洋現代主義詩派之移植於中國」，「反映出當時一些青年作者的彷徨憂鬱，頹廢感傷的情緒」，⁹⁵ 依然保留了課堂講授時的影子，可見黃繼持將課堂教學與新詩的整理和研究頗為圓融地結合起來。由此可見黃繼持對於中西文學傳統的把握，這自然得益於他長期以來對西方文學的涉獵。而在教授三十年代小說時，他則一改演講的方式，要求學生閱讀代表作品，在課堂上作介紹及述評，並加以點評，尤重寫作技巧的討論。

不過黃繼持的講授，最令學生著迷的，並不在於內容的豐富與視野的開闊，而是他對文學一腔熱愛：

聽黃的「新文學」，我們才能看到一個熱愛中國文學的人如何把自己浸淫在其中，肆意欣賞及發揮自己的感受和意見。這點根本是教文科的老師的基本條件。一個對文學作品完全不敢下判斷，在在均顯得過份客觀和公式化的國文老師，極其量只能給他一個初中教師的職位。然而，不幸的是，目下香港的大學中，竟亦有這些例子。黃講授「新文學」，主觀及情感濃烈的時候較客觀和冷靜的時候多，而愚見以為，年青的文學工作者的可愛處，正在這裡。⁹⁶

事實上，文學課堂的功能，不僅僅在於知識的傳授，更在於情感的傳達。就這一點而言，黃繼持的文學課堂，是成功的，「因為黃本身正是一個完全投入中國文學，對中國文學已到入迷程度的人」。⁹⁷

至此，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新亞、崇基三院在六十年代末都建立了新文學課程，其中包括文學史的教育（聯合、新亞、崇基），也涵蓋了新文藝寫作（聯合、新亞），既培養學生對新文學歷史知識的掌握，也塑造他們欣賞、批評、創作新文學的能力，更傳遞著對於新文學的熱忱。而按照當時中大李卓敏校長四年發展計劃的要求，三院中文系各自選擇重點，分途發展，聯合書院正是把新文學作為著力經營的領域，根據李棟 1969 年在接受採訪時所說：

本校正在計劃重新編排中文系各年級的國文讀本。二年級共同必修國文將會改成選修科四種：（一）現代文學，（二）現代散文選讀，（三）應用文，（四）古典文學。至於現代作家的專題研究，將來或會參照歐美各大學的「巴金研究」，

⁹⁴ 柯宇玲：〈崇基新文學課速寫〉，《中國學生週報》第 920 期（1970 年 3 月 6 日）。

⁹⁵ 張曼儀等合編：《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1974），頁 57, 12, 14。

⁹⁶ 柯宇玲：〈崇基新文學課速寫〉。

⁹⁷ 同上註。

「魯迅研究」，「朱自清研究」等題目，酌量增加。此外「聯合圖書館所藏現代戲劇近二千冊，也正好利用來作為專題研究的資料。⁹⁸

考察後來的課程計劃，這一目標也確實逐步實施。而待到七十年代末，三院的中文系合併，各自的新文學教育也就匯入同一軌道，而前述諸多學者的努力，也就一同為今日香港中文大學的新文學教育，奠定了基礎。

四、結語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在風雲激蕩中保留了一個獨特的空間。此地的青年，在較為自由的環境下，接受五四新文學傳統影響，在文化中國的想像下，一心繼承新文學的事業，組織文社，互相聯絡，聲氣相應，青年文運紛繁活潑，如火如荼。在此情形下，他們呼籲在大學建立新文學課程，以接續新文學的命脈為目標，因而對整理國故的現實大力批判，雖然不免意氣用事，但是他們對於新文學的熱忱，即使透過塵封的文字，依然撲面而來。

青年學生借助報刊發出自己的聲音，形成輿論壓力，促成新文學課程的建立，但是姚克、李輝英、徐訏等南來作家，以及黃繼持等本地學人對新文學教育的推動，也不可忽視。他們對於文學教育的設想不盡相同，文學觀點各異，他們開創的新文學課程，包括文學史的傳授，也有新文藝寫作訓練，側重不同，或滲入離散經驗，或浸透國族情感，但都激勵了青年文運的發展。相對而言，黃繼持因其與青年文運關係密切，兼具博覽中西的學養，他的研究與教學對於此後中文大學新文學課程的影響最為深遠。從今日的觀點來看，這一時期的新文學教育與研究也塑造了香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部分風格與特點。換言之，對香港新文學教育與新文學活動而言，這些塵封的往事，既是前世，也是今生。

⁹⁸ 〈中文大學師生談中文系課程〉，頁7。